

◆白城英烈

柳润生（二）

●王昭全 杨楷林

1932年3月，李海青部抗日军南渡松花江，柳团随大军经长岭、万发西进，奔袭扶余。16日，攻克扶余县城。李部抗日军在扶余休整一段时间后，发起了攻打农安的战斗。27日，柳团随同李部攻克哈拉海。次日，大军开到农安近郊，29日发起攻城战斗，敌援军开到，抗日军遂撤回扶余。5月5日，柳率本团随李部离扶余北上，经下岱吉渡过松花江。过江后，很快攻下肇源、肇州两县城，控制了松花江以北两肇地区。

中旬，为配合李杜、丁超部义勇军反攻哈尔滨，柳团参加了攻打肇东的战斗。李海青部抗日军于15日发起攻城，24日，守城的伪军团长涂全胜弃残城逃跑，伪县长程汝林被击毙。在连续进行的几次游击作战中，柳青庭团官兵充分发挥人强马快枪法好的优势，多立功，成为李海青部抗日军主力团之一。

6月，马占山任命李海青为“黑龙江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长，柳青庭改任该军四支队支队长，辖3个骑兵团，后扩充为5个骑兵团，全支队约2500余人枪。7月，柳支队会同马鸣春支队在李海青亲自率领下，奉马占山之命，越中东路挺进齐克路沿线活动。12月，攻克洮河地区的拉哈车站，毙日守军第十六联队远玉中大尉及松下、大西、小野等官兵近100人。8月初，柳、马两支队随李返回三肇地区，与副军长张锡武部会合。8月下旬，全军发动三袭安达战斗。26日夜，柳支队为主力夜袭得手，安达守军伪黑龙江警备骑兵团程志远团被解除武装，之后撤回。9月5日，李海青亲率2000余骑二袭安达，攻下安达车站，毙守敌数十人后撤离。11日夜，三袭安达，柳率本支队担任主攻，重创守敌后于次日晨主动撤离。此次战斗中，柳青庭被敌机炸伤头部。9月下旬，柳支队同马鸣春、刘警愚2个支队5000余骑兵，在李海青亲自率领下，转战到昂昂溪一带。24日拂晓发起攻城战斗，柳头伤未愈，仍率本支队冲在前头。天明攻下此城，将伪黑龙江警备队一

部及守城警察百人缴械后撤出。10月1日，李、柳等率部二攻此城，因敌援军突至，歼部分守敌后转移。撤至乌鱼河边，遇敌兵步骑6000余人截击，而援昂昂溪日军又尾追而至，李军陷于强敌前后夹击。经3日拼死作战，死伤数百人，方得突出乌鱼河，返回三肇地区。半年多来，柳青庭率随李军东征西讨，攻城数地，打了不少胜仗，重创敌伪，但由于无正确的政治领导，也受到一些严重挫折。后来他在回顾此段经历时写到：抗日义勇军转站辽吉黑三省，攻下城市数十，但不能守，又无政权建立和开辟根据地思想，终于与群众不能建立密切联系。由于无政治的领导，以致形成单纯的军事抗战，使抗日军逐渐地削弱下去。

11月初，东北的各路义勇军在日伪夹击下，分别撤往热河或入苏联，柳青庭所在的李海青部抗日军在东北已成孤军，在松嫩平原陷于敌伪四面包围之中。正当此时，该部接到北平抗日后援会朱子樵以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名义发来电报，令该部迅速撤往热东整顿，并将该部抗日军改番号为“辽吉黑民众救国军”第八军团。军团下辖4个支队，柳青庭仍任支队长。12月上旬，李海青任柳青庭为前敌总指挥。12月20日，全军约4万余人渡过嫩江，22日攻占大赉县城（今大安市政府驻地），之后遣前部西进，解放安广县城（时属辽宁省，今为大安市安广镇）。全军休整并补充给养后，于27日撤离大赉、安广。30日午后，李军在安广南崔大岗上日伪军遭遇，抗日军与数倍于己的有优势装备的敌军苦战至黄昏，军部和柳、马、刘支队主力均冲破敌人防线，向乾安方向突围，但此次战斗部队遭受很大损失。1933年1月，全军经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开鲁，与先期到达的马占海、邓文等会师。2月下旬，日军发动入侵热河战事，24日，数万义勇军受敌军冲击，立脚不住，撤往张北。柳支队所在的李部第八军团转移途经内蒙古草原，人烟稀少，供应困难，人员物资遭

受很大的损失。到张北后，柳青庭支队驻二泉井子。

柳青庭为了了解国内形势并接洽军需物资，于3月下旬去北平找内兄萧振瀛。萧为其从北平军分会领出部分物资弹药，并向他介绍了当时国内和华北形势及自己参与组建二十九军和长城抗战的情况。此后柳青庭便常去北平同萧相见，萧在同柳的交谈中，大谈抓军队建设的重要，他认为，国民党四分五裂，各派系争夺权势，难以全力抗战，所以要收复东北失地，要靠东北人自己去抓军队，壮大力量。柳青庭对其抓军队的意见很为赞赏，可是，抓军队如何去抓呢？他回想自己举义以来的战斗历程，弟兄们出生入死，舍身报国，虽有小胜，但终败撤至异乡，而正规军非溃即败，如此下去，抗日前途如何？他陷入彷徨和苦闷之中。

柳部撤至张北之时，中共河北省委便开始了对柳部义勇军的工作。经柳国栋介绍，中共地下党组织先派出于晓凤、刘一之到柳部工作，柳委以上士职。因柳国栋的关系，两人得以经常接触柳青庭，柳也经常向他们吐露自己内心的苦闷。两人根据中共河北省委指示，逐渐地向柳青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旧军阀的反动、国民党政府和其军队的腐败，宣传共产党的宗旨和10多年来参与北伐、创建红军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等成就。渐渐地，柳的思想认识有了变化，对共产党、社会主义从不认识到有一定的了解，并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思想。

5月26日，冯玉祥组建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冯自任总司令。柳青庭与第八军团参谋长古松年积极敦促李海青拥冯抗日。28日，李海青用李忠义名义发出通电，宣布参加抗日同盟军。冯任李忠义为第二路军总指挥，后改为第十六军军长，柳被任命为骑一师师长。参加同盟军后，他与吉鸿昌、柯庆施等接触较多，思想进步很快，抗日爱国的决心也更大了。在克复沽源、宝昌等战斗中，柳青庭率本师发挥骑兵的作用，冲锋在前，掩护在后深得吉鸿昌等将领的重视与信任。7月初，他率骑一师随十六军在北路军总指挥吉鸿昌的指挥下，参加了解放多伦战斗。在国民党政府节节南撤的败局中，同盟军孤军北进，一举克复多伦重镇，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此次战役中，柳师参加主攻，伤亡较大，战后即返回驻地整训。

（九十一）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B 白城记忆



是流行于公元前15世纪的酒器。甲骨文的同期坑位并不出土这样的铜爵。因而几乎可以肯定“爵”字取象于早于殷墟近200年前的商前期，应该创制于公元前15世纪前后。

甲骨文中的器物研究，学术界先前不是没有关注。徐中舒的《未耜考》，便考察过甲骨文中的农具。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也采纳过器物字信息。但以往的研究，总体上还是通过器物考释文字，对蕴含在器物字中的日常生活信息利用有限，对人类行为和人类思维习惯的研究少之又少。

甲骨文古器物研究不能停留在释字阶段而忽略文字本身直接记录社会生活的价值。随着党和国家的重视，冷门的甲骨学迎来了春天。如何实现冷门学科的突破？甲骨文中的器物研究可以打通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显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增长点”。

文化遗产化身为艺术审美下的吃穿住行用，融入日常生活场景，为现代生活增色，为文化消费助力

打开木刻画版工具礼盒，亲手制作一幅非遗版画；点开名为“釉彩”的APP，体验全流程制瓷工艺；进入一款AR探索手游，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纵目面具化身游戏角色……当下，传承千年的文化遗产，正以更有趣、有料、有范儿的形象，走入年轻人的生活。

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国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凝结着历史、技术、艺术因子的文化遗产，记载着灿烂的中华文明，定格民族的文化记忆。如何更好地保护和延续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

可喜的是，通过近年来一系列创新实践，文化遗产化身为艺术审美下的吃穿住行用，融入日常生活场景，为现代生活增色，为文化消费助力。

文化遗产用起来，能更好圈粉。富有底蕴、设计巧妙的文创产品，是受到年轻人欢迎的文化遗产载体之一。用这种方式激活文化遗产，让古老与现代相遇、融汇，既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也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比如，近年来故宫博物院设计研发超过7000种文创产品，受到消费者欢迎，并创下2017年全年文创产品销售额15亿元的成绩。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多家网络平台联合举办“非遗购物节”，通过线上直播、“云探店”等方式，带更多人了解非遗品牌。

文化遗产用起来，能释放产业潜力。借助快速更迭的数字技术，昔日人们眼中文化遗产“古老、沉睡千年”的形象变得愈发鲜活，释放出“文化遗产+”的更多可能。

比如，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京剧脱口秀《瑜你台上见》等文化类节目以趣味十足的表达、新颖活泼的互动，让文物、戏曲等内容与年轻人亲密接触，释放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融入非遗元素、将独特的东方美学和时尚潮流结合起来的

中国设计，掀起一股国潮风。从文化遗产中挖掘出的中国元素，充实和提升着国货的品牌内涵。

岁月的洗礼带走了很多故事，也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建筑学家吴良镛曾说：“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从热爱出发，以创新为驱动，“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时间长河中不朽的宏大与精深就能更好地走入当下，彰显文化自信，绽放新的光彩。

诗词鉴赏

悯农二首

●[唐]李绅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赏析]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度，七成以上的百姓生活在农村，他们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即使是读书人也往往不离劳作。许多家族以“耕读继世”为荣。中国古代诗歌中时时能见到农村生活的场景，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尤为突出；而采录耕作图景、传达劳动喜悦的诗歌和体察稼穡艰辛、同情百姓苦痛的诗歌，是古代农事诗常见的两个主题。前者如《诗经·周南·采芣》、刘禹锡《畚田调》；后者则以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二首》为代表，千百年来传唱不已。

《悯农二首》，又称《古风二首》，从两个角度表现了稼穡之难，体现了古代知识分子对民生的关切。稼穡之难，首先是劳作之艰辛。几千年来，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顶烈日，暴暴晒，从年初到年尾，劳作不辍。《悯农》（其二）即表现这一主题。诗歌首先描绘了农民劳作的典型场景：时已正午，赤日炎炎，农夫们珍惜有限的夏日时光，抢种抢收，日中也不回家休

息，虽汗水如注，还是忍着袭人的热浪，低头继续劳作。此情此景，我们心头涌动的也许是怜悯和同情，但诗人却想到了自己盘中的餐食：这一粒粒金黄的谷粒，哪一粒不是由农民的汗血凝成的？也许他和白居易一样心有惭作：“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稼穡之难，其次是农民之血泪。如若能够丰衣足食，农民辛苦一点也心甘情愿，但丰收与否要看天时、地利、人和。水旱交加，蝗虫肆虐，可能落得颗粒无收；而苛捐杂税，重重覆压，农民更是欲哭无泪。《悯农》（其一）则以对比手法，鲜明表现了封建社会农民在繁重税负下苦苦挣扎、衣食无着的处境。春天种下一粒粟米，秋天可收万颗粮食，土地的赏赐不可谓不慷慨。当今四海之内无闲田，如果按照前面说的理想状态，农民应该衣食无忧才是，可现实却是“农夫犹饿死”。如此触目惊心，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虽然诗人没有说出答案，其批判之意却不言而喻。

这两首小诗，情辞深挚，质朴自然，朗朗上口，“纯以意胜。不在言语之工”，宜乎千百年来传唱不休。（南果）

甲骨文里的古器物考古

●常淑敏

我国研究古器物的历史源远流长。古器物研究通常有两种情形：一是按类别研究；二是打通类别按时代研究。还有一类古器物资源，具有特殊的价值，需要独特的研究方法。这就是甲骨文里的古器物。

甲骨文字的构形，既“取象”于日月山川、风云雷电、动植物、人体器官，同时也有大量器物入字。炊器如鼎、鬲；食器如簋、豆；酒器如爵、斝；兵器如戈、钺；日常用具如床、席等等。不妨称这类文字为“器物字”。据统计，甲骨文中的“器物字”占甲骨文单字的将近一半（依《甲骨文编》统计）。

甲骨文通过“象形”，保留了古代的器物样式，通过“会意”保留了器物的使用方法，甚至记录了当时人们的行为。这是传统器物学很难获取的信息。

我们常常端坐桌前或卧床而睡，也许忘了3000年前的祖先习惯的是“席地而跪”，并且同样有简易的“床”。甲骨文、三个字，描述“席”和“床”的使用不可谓不生动。

鬲是炊器，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了近

2000年。考古发掘出的完整陶鬲恐有数万之多。然而古人究竟如何用鬲？甲骨文、三字给出了线索。以短竿炊煮，享鸡禽美食，也算是幸福人生吧。

不少人误以为商代文书全都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甲骨文、（典、册）二字，揭示商人的日常书写应该是简册。古文献说“唯股先人，有典有册”在器物图形里得到印证。

即使辛勤的田野考古，有些器物也是“挖”不出来的。例如绳索，例如大多数数木器。但这些器物可以“存活”于甲骨文中。我们熟悉的“祝福”二字，左侧使用了“示”为偏旁。“示”在甲骨文中表示祖先死后“神主”所在，本是器物象形，或因材质易腐，实物已亡。但甲骨文保存了这种特殊的器具。通过它，我们可以观察古人丰富的精神生活。（祝），记录人们在神位前诉说心愿；和，记录人们向祖先荐酒供食。今日农村的祭祖流程早有源头。

研究甲骨文中古器物，不仅可以获取远古信息，对于现代学术的发展同样重要。

一个成功的例子便是考古学家利用器物字助力田野发掘。这个案例发生在安阳殷墟。车马坑的发掘是田野考古中的重大难题。受限于对古代马车结构了解不足，考古学家早年清理出的商代马车均是直衡车（古车前端架于马项之上的横木是直的）。后来发现甲骨文中的“车”字有多种写法，既有直衡车，还有曲衡车。受此启发，考古学家按图索骥，果然清理出曲衡车。

甲骨文的创制时间事关汉字起源。研究器物字最有可能破解甲骨文的创制时代。甲骨文字记录的器物形象，与发掘出土的器物一样具有时代特征。“爵”字的“取象”特征是深腹、长流、平底。甲骨文发现于殷墟，但“爵”的字形却并不反映商代晚期的形象，而是具有明确的商代早期特征。因为殷墟的铜爵是凸底，商代早期的铜爵才有深腹平底之特征。“爵”字的局部细节，也同样反映商早期特征。甲骨文的爵字有多种写法，最常见的两种是和。前者表现了纤细的三条实足；后者表现的却是上粗下细的三条空足。此类平底空足和平底实足的铜爵，正

四大名著之称从何而来

●苗怀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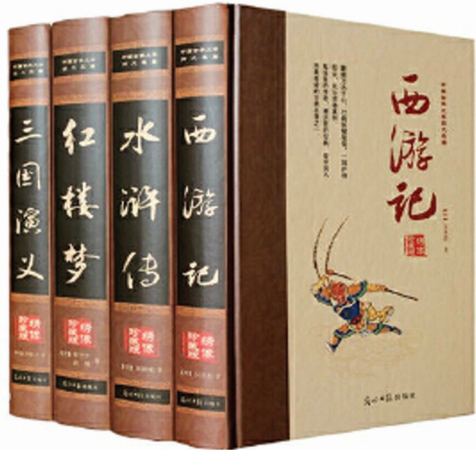
有意思的是，李渔通过比较，否定王世贞的说法，将四大奇书的发明权给了冯梦龙。至于冯梦龙究竟是如何说的，什么时候说的，限于资料，已经无法弄清。这很可能只是当时坊间一个流行的说法，不过借用冯梦龙的名头而已。

四大奇书与四大名著的前三部都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红楼梦》取代了《金瓶梅》。既然如此，那四大名著的说法怎么也得有200多年的历史吧。其实不然，这事不能凭感觉，还是要靠材料来说话，翻检清代文献资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四大名著一词。

那么，这一叫法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各类典籍加上报刊，浩如烟海，要找到这个词最早的出处谈何容易，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时至今日，随着文献数字化开发的，各类大型数据库相继建立，利用这些丰富的电子资源，成千上万册典籍，一秒之内就可以做到逐字检索，四大名著的问题也可以由此得到解决，至少是部分解决。

就目前搜检的情况来看，四大名著一词最早出现在1919年。这一年的2月14日，《申报》开始刊载求古斋书帖社的广告，号称“四大名著特价六折”，后面是对《廿五史弹词》《随园诗话丛话》《金圣叹、陈眉公才子尺牍》《唐诗白话解》这四大名著的简介。这份广告又见于同年5月8日的《新闻报》上。

显然这是为推销书籍而创用的一个词语，说白了，就是一个卖书的噱头。虽然是叫四大名著，但内涵与现在的完全不同。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四大名著之说并非直接由四大奇书演变而来。至于求古斋书帖社是否第一家使用四大名著一词，此前是否有人用过，还需要材料来证明。大体可以这样说，四大名著一词是清末民初书商为推销书籍所创的词语。



四大名著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部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合称，这早已是一个人人皆知的文学常识。但是如果要问，四大名著之称是谁从何时叫起的，恐怕就没有人能回答上来了。

一

从理论上说，四大名著之称再早都不会超过300年，原因很简单，其中的《红楼梦》乾隆年间才面世，到现在也就200多年。此前有四大奇书、六才子书、十才子书等称呼，但从来没有四大名著之说。

与四大名著最接近的是四大奇书，从相关记载来看，四大奇书之说最早出自李渔之口：“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梦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三国演义》序）

年10省17院校《作家谈创作》编辑组编印《中国当代作家谈写作》一书，其中有一篇黄飞脚的《构思点点》，文中写道：“我小时候喜欢看故事书，以前看过些古典小说，什么四大名著，三言二拍都看过。”这里虽然没有具体说出四大名著包括哪四部小说，但明确说是古典小说。

1982年，《上饶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刊载汪嘉言的文章《漫谈自学语文——为上饶师专学生讲》，其中提到“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同一年，《国外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署名“平”的文章《〈红楼梦〉全译本在法国出版》，提出另一说法：“中国的四大名著（另外三部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金瓶梅》）之一的《红楼梦》，无疑是中国小说中水平最高，写得最精彩和最全面的。”

可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四大名著开始指向中国古典小说，但还有不同的说法。之所以此时发生这一转变，与时代文化风气有关。粉碎“四人帮”之后，开始拨乱反正，以前被视为封建落后的古代文学作品解禁，民间出现了读书热潮，《三国演义》这四部小说作品本就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历代读者所喜爱，此时受到追捧，被称作四大名著，自在情理之中。

其后，四大名著逐渐成为专有名词，内涵固定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四部小说的合称。

三

文章写到这里，可以进行总结了。据笔者搜检各类数据库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四大名著一词最早出现在清末民初，是出版商为宣传书籍而创用的一个词语，长期以来其内涵并不固定。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和古代小说联系起来，很快成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部小说的合称，成为专有名词。

如果笔者上述推断成立的话，四大名著成为专有名词也不过才40来年的时间，这可能和很多人的感觉很不一样，但事实就是如此。不管是谁最先将四大名著与古代小说挂钩，这一叫法很快就得到认可并广为流传乃至成为一个基本的文学常识，原先不断变化的内涵被固定下来，浓厚的广告色彩退去，被赋予一种庄重感，这应该说是人们的共识和选择。在可以想见的未来，这个叫法应该是不会再改变了。

二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说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四部小说，人们遂将这四部小说合称四大名著。这一说法有其道理，但目前还没有见到确切可信的資料。

进入1980年，情况发生变化。从这一年开始，四大名著这个称呼开始和《三国演义》等这四部古代小说联系起来。这一